



Stellar Worship and the Genesis of Saviour Star Concept in Ancient China

Wang Zijin

Abstract: Stars, widely worshipped among Chinese people of ancient times, is considered closely related to harvest, war and peace, or life and death, and therefore occupies a vital position in celestial hierarchy. Traces of astrology's role in ancient people's decision-making on daily life could be found in *Ri Shu*, "The Day Book", a popular divination book in pre-Qin, Qin and Han period. In a Qin-period copy of *Ri Shu* excavated from Yun Meng Shuihudi, there is a chapter named Star, which helps the readers predict fortune by observing the stars and identify the extremely fortunate or ominous situation. Due to prevalent belief of the time in interactions between heaven and man, the stars' names are sometimes correspondent to people of different social status. For example, in the astrologists' chapter of *Shiji*, some stars are claimed to symbolize emperors, and some others belong respectively to three excellencies (*sangong*, three top officials in Han dynasty's political system, i.e. Premier, Grand Commandant, and Grandee Secretary), concubines, feudal vassals, brigade generals, etc.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some stars like Niu Lang (cow herder) or Zhi Nv (weaver) are named after working people. It is in this clos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tars and worldly affairs that the personified stars emerged in Qin and Han period. The lexis Jiu Xing (saviour star) has to do with catastrophes in turbulent times, in which people expect helplessly for salvation. The word saviour in "saviour star" embodies the special social ideals in days of turmoil. From its genesis in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to its prevalent appearance in the folk literatures of Ming and Qing period, the admiration of saviour star, as a cultural phenomenon, reflects the social psyche of the time. A study on this cultural and social phenomenon could uncover the deep influence of ancient theory about interactions between heaven and man as well as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ancient folk superstitions.

Keywords: star; star sacrifice; astrology; *astrology chapter of Ri Shu*; Bright Star; saviour star

Author: Wang Zijin received his master's degree in history from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China in 1984. At different times, he had served respectively as professor at the History Department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 visiting professor at the Humanities School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Hongguo Professor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He is now first grade professor in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of Renmin University as well as advisor for Historical Society of Qin & Han Dynasties. His main works include: *A Study on Regional Cultures of Qin and Han Dynasties*, *Transportation History of Qin and Han Period*, *A Study on Qin and Han Period's Social Consciousness*, *The Black Power: A Critical Study on Ancient Chinese Superstitions*, *Culture Study in Shih Chi: Anthropological Exploration in Early Chinese History Writing*, *A Study on Qin and Han Period's Environment*, *Qin and Han History: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mpire*.



古代中國的星崇拜與“救星”意識的發生

王子今



[摘要] 在中國上古信仰體系中，有着不少星崇拜的內容。當時人們想象中的天界秩序，星辰佔據了顯要地位。星象與收成、兵戰以及個人、家族的命運包括生死健康等等都有神秘的關係。在先秦、秦漢社會通行的用於趨吉避凶選擇的《日書》中，可以看到根據星象判斷行為宜忌的內容。雲夢睡虎地秦簡《日書》中的《星》篇，也是告知人們如何以星象判斷未來吉凶的；包括在極端的情況下將致“百事凶”，相反則有“百事吉”的預示。在深信“天人之應”的意識背景下，天上的星辰名號，有時可與世間某種社會身份對應。《史記·天官書》言天際星象，既有象徵“太一”（天帝）者，也有對應“三公”“正妃”“藩臣”“上將”“次將”“貴相”

“諸侯”等諸星座，還有對應社會底層人等的“賤人之宰”。在這一時期，具有明確勞作者身份的“牽牛”“織女”成爲天星名號，頗值得注意。星象與人事的密切關係，使得古人天文知識在民俗方面的表現，是星與人的對應性結合，出現了擬人化的星。天際星辰與世間人事的對應，天星名號與人物形象的結合，在秦漢時期可以找到許多明確的例證。至於體現星崇拜意識遺存的“救星”稱謂的出現，與亂世的災難有關。對於“救星”的崇敬，反映出了處在極端困苦境遇之中的人們完全無助的心態。“救星”的“救”，作爲一種社會渴求，其實是亂世夢想的特殊表現。後來引人注目的文化現象，則是民間對“救星”語彙使用的普遍化。這一現象，較爲集中地表現在俗文學作品中。從元明時代“救星”語彙的產生，到明清小說中“救星”一語的泛用，可以看出後世形成讚頌“救星”的社會心理基礎。考察與此相關社會文化現象，既可以發現天人關係學說的久遠影響，也有助於理解中國古代民間政治迷信的歷史淵源。

[關鍵詞] 星 星祭 星占 《日書·星》 明星 救星

[作者簡介] 王子今，1984年在西北大學獲得歷史學碩士學位，曾任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院訪問教授，南京師範大學鴻國講座教授，現爲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一級教授，兼任中國秦漢史研究會顧問；主要從事秦漢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秦漢區域文化研究》《秦漢交通史稿》《秦漢社會意識研究》《權力的黑光：中國封建政治迷信批判》《〈史記〉的文化發掘：中國早期史學的人類學探索》《秦漢時期生態環境研究》《秦漢史：帝國的成立》等。

在中國上古信仰體系中，有着不少星崇拜的內容。當時人們想象中的天界秩序，星辰佔據了顯要地位。天星名號與人物形象的結合，在秦漢時期已經可以看到明確的史例。到元明清時期，民俗文化現象中所見“救星”稱謂的泛用，反映出了處在困苦境遇之中的人們完全無助的心態，是人們亂世夢想的特殊表現。考察中國古代星辰崇拜意識的流變，關注天文與人文神秘對應關係的政治解說，分析元明清俗文學中“救星”語彙的頻繁出現，既有助於認識上古信仰體系的世俗風貌和精神基底，也有助於發現天人關係學說的久遠影響，更有助於理解古代民間政治迷信的歷史淵源。

一 上古“星”崇拜與“祭星”禮俗

關注上古時代的天文意識，可以發現，中國古人曾經將包括星象在內的天界秩序，看作充滿神秘意義的體系和制度；同時，又深信天文與人文的對應關係。對“星”的崇拜，曾經顯著影響了社會理念和社會生活。

《尚書·洪範》曰：“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月星辰，五月曆數。”“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漢代孔安國傳：“星，民象。故衆民惟若星。箕星好風，畢星好雨，亦民所好。”^①所謂“五紀：一曰歲”者，其實也是“星”。而“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體現出農耕社會“庶民”“衆民”的“風雨時節”期望。^②《管子·四時》寫道，“東方曰星”“南方曰日”“西方曰辰”“北方曰月”。在天象秩序中，“星”“辰”非常重要。而體現為“柔風甘雨”，使得“百姓乃壽，百蟲乃蕃”的即所謂“星德”，“其德喜贏而發出節”。^③《孫臏兵法·月戰》：“孫子曰：十戰而六勝，以星也。十戰而七勝，以日者也。十戰而八勝，以月者也。”反映“星”在兵陰陽學說中佔據與“日”“月”並列的地位。星象與兵戰的關係，又見於《史記·匈奴列傳》：“舉事而候星月。”《史記·封禪書》記述秦漢神學中心雍地的祭祀之所：“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佈、諸嚴、諸述之屬，百有餘廟。”在秦帝國最重要的神祀中心規模為“百有餘廟”之信仰體系中，“日、月”之後，“風”“雨”之前，“星”即所謂“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等，作為崇拜對象佔據了當時的信仰世界中相當大的比例。據唐人司馬貞《索隱》的解釋，“諸布”也與“星”崇拜有關：“案：《爾雅》：‘祭星曰布。’或‘諸布’是祭星之處。”^④漢代民間信仰史料也提供了重要的相關信息。河南省南陽市出土的許阿瞿墓誌，感歎這位五歲童子的夭亡時寫道：“年甫五歲，去離世榮。遂就長夜，不見日星。神靈獨處，下歸窈冥。”^⑤“日星”以分別照耀晝夜的光明，受到特別的崇敬。

文物資料中可見於楚帛書所反映的星歲紀年和歲星占的內容。湖北省隨州市發現的曾侯乙墓，所出土的箱蓋漆文表現的星象，有學者認為其有確定的意義。湖南省長沙市發現的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帛書有《五星占》。^⑥所謂《天文氣象雜占》中的彗星圖，也各有對應的世間政治軍事現象。有的研究者稱之為“彗星圖占”。^⑦大量漢墓出土畫像資料中，多有表現天際星座的畫面。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西安交通大學西漢墓葬壁畫二十八宿星圖^⑧、南陽畫像石星象圖^⑨等，

①〔清〕畢沅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第189、192頁。

②〔漢〕班固：《漢書·地理志下》（北京：中華書局，1962）：“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漢書·魏相傳》：“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漢鏡銘文“風雨時節五穀熟”是常見句式。

③黎翔鳳：《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梁運華整理，第842頁。

④〔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第1357頁。《漢書·郊祀志上》也有同樣的說法。可見，西漢對秦的祠祀體系予以全面繼承。

⑤南陽市博物館：“南陽發現東漢許阿瞿墓誌畫像石”，《文物》8（1974）。

⑥王樹金：“馬王堆漢墓帛書《五星占》研究述評”，《湖南省博物館館刊》7（2010）。

⑦席澤宗：“馬王堆漢墓帛書中的彗星圖”，《文物》2（1978）；王樹金：“馬王堆漢墓帛書《天文氣象雜占》研究三十年”，《湖南省博物館館刊》4（2007）。

⑧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學西漢壁畫墓》（西安：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1991）。

⑨韓玉祥主編：《南陽漢代天文畫像石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

均顯示了當時人對“星”的崇拜。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養生方》中，可見“敢告東君明星”等文字。^①這裏所謂“明星”，指的是可以以其神力影響人生健康與命運前景的天星。這裏的“告”，應是指請示、祭告一類在神聖語境中的對話形式。

二 星象與人世“吉”“凶”

在中國古人的意識中，天際星象與人世“吉”“凶”有着神秘的對應關係。

在先秦、秦漢社會通行的用於趨吉避凶選擇的《日書》中，可以看到根據星象判斷行為宜忌的內容。例如，湖北省隨州市孔家坡八號墓出土《日書》中的《星》篇，在二十八星宿每宿名下各有警示文字，提醒使用者選擇時日必須注意。其中有：“東辟（壁），不可行，百事凶。司不（府）。以生子，不完。不可為它事。（六二）。”^②

中國古人認為，有的星象出現，預示着“疾疫”；有的星象出現，預示着“饑饉”；有的星象出現，預示着戰爭或者政治變亂。例如，《史記·天官書》：“（土星、水星、金星）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立公王。”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出土的秦簡《日書》中的《星》篇，也告知人們，如何以星象判斷未來吉凶——極端的情況下，將致“百事凶”；相反，則有“百事吉”的預示。^③“玄戈”是星名。睡虎地秦簡《日書》有《玄戈》篇，其中寫道，在有的情況下將“大凶”，有的情況下“少吉”，有的情況下則“大吉”。^④導致最後一種情形即“大吉”而出現的天文現象，其積極的社會作用值得特別注意。對於《史記·天官書》所謂“黃園和角”，唐人張守節《正義》解釋道：“太白星圓，天下和平。”對於“畢星”，又說：“星明大，天下安，遠夷入貢。”又如，《漢書·天文志》寫道：“填星所居，國吉。”說的都是全社會普遍期望的吉祥星象。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民豐縣尼雅遺址出土的織錦文字“五星出東方利中國”^⑤，更是知名度非常高的體現相關理念的文物發現。

《史記·律書》還介紹了當時人知識體系中二十八宿“營室”的作用：“營室者，主營胎陽氣而產之。”就個人境遇而言，在中國上古時代，難產往往會導致母子死亡，而營室這時對於產婦及其家庭的意義，可以說有救死的作用。

三 擬人星：人際稱謂與星辰名號

星辰崇拜，體現古代中國人信仰理念中的天文觀。而天文與人文的對應，透露出有關天人關係的思想。《史記·天官書》寫道：“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司馬遷（前145—？）在致任安的信中自敘撰寫《史記》的心志，有“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話。班固（32—92）把這段文字記錄在《漢書·司馬遷傳》中。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介紹“八書”的撰述主題，也說“天人之際，承敝通變”^⑥。有人評價《史記》，以為正是因為追求這一境界，於是成就輝煌，“七十列傳，各發一義，皆有明於天人古今之數”，而《史記·貨殖列傳》“亦天人古今之大會也”。^⑦

理解“究天人之際”的文意，需要回到當時的文化背景，來關注人們對於“天”具有濃重神秘色彩的內心崇敬。曾經就《公羊春秋》的研讀對司馬遷有所指導的董仲舒（前179—前104）曾經應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的詢問對“天人之應”多所討論。^⑧《漢書·劉歆傳》說：“劉

① 魏啓鵬、胡翔麟：《馬王堆漢墓醫術校釋（貳）》（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第55頁。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編著：《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第134頁。

③④ 王子今：《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疏證》（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第159—161、134—135頁。

⑤ 《絲路之魂：天府之國與絲綢之路》編輯委員會編著：《絲路之魂：天府之國與絲綢之路》（北京：商務印書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第106頁。

⑥ [漢]司馬遷：《史記》，第3319頁。

⑦ [清]惲敬：《大雲山房文稿·讀貨殖列傳》（上海：世界書局，1937），卷2。

⑧ [漢]班固：《漢書·董仲舒傳》，第2513頁。

氏《鴻范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史記·五帝本紀》說堯“敬順昊天”，張守節《正義》解釋為“敬天”。後世註家對《史記》文字的解說，也可見“敬天常”^①“嚴敬天威”^②等說法。如果認識到秦漢社會的“敬天”理念包含對自然的尊重，對生態的愛護，就應當珍視其中值得繼承的文化因素。《韓詩外傳》卷七寫道：“善為政者，循情性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又說：“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詩》曰：‘昊天太憮，予慎無辜。’”當時，“天人”與“古今”的關係，似乎是許多人共同關心的文化命題。漢武帝說：“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董仲舒說：“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③公孫弘也曾經言及“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④。《淮南子·泰族訓》寫道：“天之與人有與相通也。”“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見其終始，可謂知略矣”。《淮南子·要略》總結全書，也強調“尊天”“仰天”“取象於天”，“上因天時”，“合諸人則”，“通古今之論”，“經古今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變”，“擘畫人事之終”。看來，相信“天人”之間存在神秘關係是貫通“古今”的規律，代表了一種具有顯著時代特徵的歷史文化理念。^⑤

在深信“天人之應”的意識背景下，天上星辰名號，有時可與世間某種社會身份對應。《史記·天官書》言天際星象，既有象徵“太一”者，又有對應“三公”“正妃”“藩臣”“上將”“次將”“貴相”“諸侯”等諸星座。張守節《正義》釋“太一”為“天帝之別名也”，又引劉伯莊云：“泰一，天神之最尊貴者也。”相反，對應社會底層人等者，有“賤人之牢”。星象與人事的密切關係，使得古人天文知識在民俗方面的表現，就是出現了星與人的對應性結合，出現了擬人化的星。例如，《史記·天官書》說到“婺女”星；張守節《正義》解釋，“婺女”就是“須女”，又說：“須女，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主布帛裁製嫁娶。”而“婺女”，按照《廣雅》的說法就是“務女”^⑥，勞作者的身份是明確的。此星象徵的世間身份是負責“布帛裁製”的“婦職之卑者”。而“織女”星，據張守節《正義》，“主果蓏絲帛珍寶”，如果星光“暗而微”，則“天下女工廢”。^⑦勞動者身份成為天星名號的情形，值得人們特別注意。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的《取妻》篇可見“牽牛以取織女”的說法^⑧，說明至遲在秦代，牛郎織女愛情傳說已經形成了比較確定的主題，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結構。而男耕女織的勞動生活以此擬人形式進入到天文體系。

在中國的傳說時代，部族聯盟領袖“蚩尤”曾經與黃帝、炎帝作戰，被尊為“兵主”。“蚩尤旗”則成為星象名號。《史記·五帝本紀》裴駟《集解》引《皇覽》曰：“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闕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匹絳帛，民名為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陽郡鉅野縣重聚，大小與闕冢等。傳言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黃帝殺之，身體異處，故別葬之。”此“蚩尤旗”是兵戰之象。《漢書·五行志下》：“占曰：‘是為蚩尤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所謂“赤氣”，多理解為星象。《後漢書·獻帝紀》：“（初平二年）九月，蚩尤旗見於角、亢。”《續漢書·天文志》：“孝獻初平二年九月，蚩尤旗見，長十餘丈，色白，出角、亢之南。”《後漢書·蘇竟傳》：“流星狀似蚩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至延牙營上，散為數百而滅。”如果理解“蚩尤”是遠古人物，則“蚩尤旗”或許可以看作最早的以人名為天星符號的實例。還有一位神話人物“造父”的名字也成為星座代號。造父是秦人先祖，曾經為周穆王駕馭八駿，遠行至西王母之邦。據《晉書·天文志》，有被命名為“造

① [漢]司馬遷：《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司馬貞《索隱》引《呂氏春秋》，第3038頁。

② [漢]司馬遷：《史記·周本紀》裴駟《集解》引孔安國曰，第138頁。

③ [漢]班固：《漢書·董仲舒傳》，第2513、2515頁。

④ [漢]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第3119頁。

⑤ 王子今：“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光明日報》2015-09-09。

⑥⑦ [漢]司馬遷：《史記·天官書》司馬貞《索隱》引《廣雅》，第1311頁。

⑧ 王子今：《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疏證》，第292頁。

父”的天星。^①造父雖然後來身份顯貴，但是成名時的身份，只是服務於君王的御車者。

據《史記·封禪書》記載，秦代已經在杜亳建“壽星祠”。司馬貞《索隱》說：壽星，就是南極老人星。老人星出現，“則天下理安”，所以“祠之以祈福壽”。《續漢書·禮儀志中》也說到仲秋之月在國都南郊老人廟“祀老人星”的情形。

明季小說《西遊記》裏的“太白金星”，在天際世界是一位風格平和的老者。^②唐李筌《太白陰經·雜占·太白占》指出，傳說淵源久遠的“太白金星”具有多方面的神能：“太白一名長庚，西方金德，白虎之精。……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太白主為大將，為威勢，為殺伐。”明人萬民英《星學大成·三辰通載·五星》也寫道：“雙女宮太白星，又名天軍星，主兵軍武貴也。詩斷：太白金星主大權，喜臨楚分息塵煙。出則將兮入則相，三分足用喜駢駢。”顧炎武《日知錄·湘君》說神界配偶形式時指出：“甚矣，人之好言色也。”所舉的第一個例子就是“太白星”：“太白，星也，而有妻。《甘氏星經》曰：‘太白上公，妻曰女媧。女媧居南斗，食厲，天下祭之，曰明星。’”天星“有妻”，應看作體現民間對作為崇拜對象的天界予以人性化理解的情形。民間傳說中太白星的人格化，至遲不晚於漢代。《風俗通義·正失》“東方朔”條：“俗言東方朔太白星精。”《太平廣記·梁玉清》講述了這樣的故事：“《東方朔內傳》云：秦併六國，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衛承莊，逃入衛城少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嶽搜捕焉。太白歸位，衛承莊逃焉。梁玉清有子名休，玉清謫於北斗下，常春。其子乃配於河伯，驂乘行雨。子休每至少仙洞，恥其母淫奔之所，輒回馭。故此地常少雨焉。（出《獨異志》）”與漢武帝時代真實歷史人物東方朔相聯繫的太白星，在這些傳說中卻是不大莊重的形象。

另一則與太白星有關的故事，即五代人王定保《唐摭言·知己》說李白見識於賀知章事：“李太白始自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業贄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揚眉謂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③這是以天星喻非常之人的例證。

四 俗文學作品中的“救星”

體現星崇拜意識遺存的人際稱謂“救星”出現較晚，但卻形成了非常廣泛的社會影響。

文獻中所看到的“救星”語彙最早的出現，見於遼代耶律純《星命總括》卷上的一句話：“方入煞神之初，或出煞神之末，不見救星來，未有不凶者。”看來，“救星”的說法很可能源起於古星象學。

分析中國傳統社會心理，似乎“救星”意識的生成，與亂世的災難有關。《呂氏春秋·勸學》說到“救病”，東漢高誘註：“救，治也。”《說文解字·支部》：“救，止也。”清人段玉裁註：“《論語》：‘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馬曰：‘救猶止也。’馬意救與止稍別。許謂凡止皆謂之救。”《漢書·蒯通傳》有“折北不救”的說法，唐人顏師古解釋說，“不救”，就是“無援助”。“救，助也”，是通行的訓詁定義。^④對於“救星”的崇敬，大概出自人們在極端困苦之中完全無助境遇下的心態。“救星”的“救”，作為一種社會渴求，其實是亂世夢想的特殊表現。

後來引人注目的文化現象，是民間對“救星”語彙使用的普遍化。這一現象，以俗文學作

① [唐]房玄齡等：《晉書·天文志上》（北京：中華書局，1974）：“傳舍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一曰司馬，或曰伯樂。”

② 太白金星即長庚老。曾上炎《西遊記辭典》（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長庚老】長庚星。神話傳說中的上界神仙之一太白金星。”《西遊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第三回《四海千山皆拱伏九幽十類盡除名》與第四回《官封弼馬心何足名注齊天意未寧》有“太白長庚星”“太白金星”“金星”“招安”“妖猴孫悟空”故事，形象為“老人”，自稱“西方太白金星”，又自稱“老漢”。孫悟空嗔語亦謂“金星老兒”。

③ [清]王琦註：《李太白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77）引《唐摭言》：“李太白始自蜀至京，道未甚振，因以所業贄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曰：‘子謫仙人也。’”（第166頁）文句略有不同。

④ [南朝宋]慧琳：《音義·幻師毘陀所說神咒經》“救之”條：“《廣雅》云：救猶助也。謂相起助也。《考贊》云：援助也。”參見《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徐時儀校註，第1250頁。

品中的表現較為集中。“救星”的出現，以明代小說中最高為密集。而《醒世姻緣傳》中出現“救星”頻次尤高。如第十七回《病瘡漢心虛見鬼 黷貨吏褫職還鄉》：“……卻又遇着一個救星，卻是司禮監金公。”第十八回《富家顯宦倒提親 上舍官人雙出殯》：“若請個名醫來看，或者還有救星，也不可無。”第五十六回《狄員外納妾代庖 薛素姐毆夫生氣》：“虧得天不從人，狄員外每次都有救星。”第五十七回《孤兒將死遇恩人 凶老禱神逢惡報》：“若那命不該死，他自然神差鬼使，必有救星。”^①所謂“有救星”，是面臨“災難”時的深心期盼。作者對“救星”這一語彙的偏好，或許體現了當時民間的語言習慣。此外，又如馮夢龍《新列國志》第七十回《殺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齊魯晉昭公尋盟》：“靈王一連三日，沒有飲食下嚥，餓倒在地，不能行動。單單只有兩目睜開，看着路旁，專望一識面之人經過此地，便是救星。”^②也是同類同的例證。凌濛初《初刻拍案驚奇》卷二十九《通閩闖堅心燈火 鬧囹圄捷報旗鈴》：“張媽媽道：‘你做了不老成的事！幾把我老人家急死。若非有此番天救星，這事怎生了結？’”^③此所謂“天救星”，或作“大救星”。^④

大家比較熟悉的文學作品，如《西遊記》中，也可見“救星”語彙的使用。第三十一回《豬八戒義激猴王 孫行者智降妖怪》：“師父在洞，幸虧了一個救星。原是寶象國王第三個公主，被那怪攝來者。”第五十五回《色邪淫戲唐三藏 性正修持不壞身》：“孫大聖纔按雲頭，對八戒、沙僧道：‘兄弟放心，師父有救星了。’沙僧道：‘是那裏救星？’行者道：‘纔然菩薩指示，教我告請昴日星官。老孫去來。’”營救唐三藏的“昴日星官”，當然是真正的名副其實的“救星”。

與“有救星”對應的是“沒救星”。《金瓶梅》第五十九回《西門慶露陽驚愛月 李瓶兒睹物哭官哥》寫道：官哥兒夭亡，“闔家大小放聲號哭，那李瓶兒搥耳撓腮，一頭撞在地下，哭的昏過去，半日方纔蘇省，攬着他大放聲哭叫道：‘我的沒救星兒，心疼殺我了！’”“西門慶即令小廝收拾前廳西廂房乾淨，放下兩條寬凳，要把孩子連枕席被褥抬出去那裏挺放。那李瓶兒倘在孩兒身上，兩手攬抱著，那裏肯放！口口聲聲直叫：‘沒救星的冤家，嬌嬌的兒，生揭了我的心肝去了！’”又第六十二回《潘道士法遣黃巾士 西門慶大哭李瓶兒》：“西門慶歸到捲棚內，看着收拾燈壇，見沒救星，心中甚慟，向伯爵，不覺眼淚出。”

“救星”作為小說語言，亦為較高層次的知識人所接受。李贄（1527—1602）評議《水滸》第三十八回《及時雨會神行太保 黑旋風鬥浪裏白條》：“李和尚曰：宋公明每至盡頭處，便有救星的，是真命強盜。”^⑤

明代劇曲所見“救星”語彙，有孟稱舜《酌江集》：“今來遇着丈人，這是俺命兒裏該有救星，天幸得遇丈人，望賜一言救俺則個。”也說“有救星”。又如：“【駐馬聽】枉煞心癡，向猛虎叢中來救你；無端負義，這鬼門關上訴憑誰。遇着頑禽蠢木總無知，道是屠牛伐樹都差異，這搭兒難迴避，丈人呵，俺不道救星兒恰撞你。”^⑥又如張大復《快活三》卷上“【風入松】看如螺雲結晚山埋，見蜃樓海市堪怪，江豚吹浪如山大，簸箕兒輕舟風擺，許不盡豬羊賽，叫不應

① [明]西周生：《醒世姻緣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黃肅秋 校點，第251、265—266、812、824、854、1257、1282、1293、1308、137、2424頁。

② [明]馮夢龍 編：《新列國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陸樹倫、竺少華 標點，第827頁。

③ 又如，第五十九回《孝女於歸全四德 悍妻逞毒害雙親》：“唬得臉上沒了人色，左顧右盼，誰是他的個救星？”第八十八回《薛素姐送回明水 呂廚子配死高郵》：“衆人合了一股，大家作踐。若不是有個救星，這個狗命，料想也是難逃。”第九十回《善女人死後登仙 純孝子病中得藥》：“也是胡無翳手段高明，又是這些病人應有救星，手到病除，一百個人吃了藥，倒有九十九個好。”第九十一回《狄經司受制嬖妾 吳推府考察屬官》：“幸得狄希陳漸漸的有了救星，離成都不遠，只有了三站之地……”第九十二回《義徒從厚待師母 逆婦假手殺親兒》：“源源相接，得晁夫人這個救星，年來不致饑寒。”第九十六回《兩道婆騙去財衆衙役奪回官物》：“雖自家不到跟前，可也是我的護身符，劉姐也是救星。”第一百回《狄希陳難星退舍 薛素姐惡貫滿盈》：“胡無翳掐算了一會，說道：‘喜得還有救星。……’”

④ 明崇禎尚友堂刻本《拍案驚奇》作“大救星”。

⑤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水滸傳》（明容與堂刻本）。

⑥ 《古今名劇合選》（明崇禎刻本）。

救星來。”

講究“星氣”和“人事”對應關係的明人萬民英《星學大成》一書中“救星”凡三十見。可以推知民間俗語“救星”的普及，依然是有以“星學”為標榜的文化背景的。書中亦多言“有救星”“無救星”，如卷十五“留段”條：“火入留段，名為天剗天哭星。若人於身命見之，皆主好殺。其心不慈不仁。若有救星，卻主平善。若入陷無救星，皆坐遠配軍州不祥之禍斷之。”

清代文學名著《紅樓夢》中，也可見使用“救星”俗語的例證。第一〇二回《寧國府骨肉病災 大觀園符水驅妖孽》：“賈蓉沒有聽完，唬得面上失色道：‘先生說的很是。但與那卦又不太相合，到底有妨礙麼？’毛半仙道：‘你不用慌，待我慢慢的再看。’低着頭又咕噥了一會子，便說：‘好了，有救星了！算出已上有貴神解救，謂之魄化魂歸。先憂後喜，是不妨事的。只要小心些就是了。’又如第一一五回《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證同類寶玉失相知》：“賈政忽然想起，頭裏寶玉的病是和尚治好的，這會子和尚來，或者有救星。”

總之，作為民俗語言現象，“救星”在相當寬廣的社會層面的普遍使用，反映了大眾百姓面對災厄病痛時的強烈求助願望。尤其在社會動盪年代，這種表現就成為十分醒目的文化景觀，也為後世讚頌“救星”奠定了社會心理基礎。

·學術微信·

2017年10月21—22日，由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學哲學系，上海市中西哲學與文化比較研究會聯合舉辦的主題為“酒與哲學”的學術論壇在華東師範大學閔行校區召開，來自國內外學術界的三十餘位專家學者出席了研討會，深入探究“酒文化”在中西文化體系中扮演的角色。《南國學術》總編輯田衛平應邀出席，並在論壇上宣讀了論文《從“酉”字搭配看中國的“酒”哲學》。

2017年10月21—22日，由中國宋史研究會主辦，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古籍研究所承辦的“新視角·新方法·新觀點——宋史學術前沿論壇”在上海師範大學桂林路校區召開。來自全國各地的四十多位專家學者，圍繞當前宋史研究如何持續深入發展，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交流。《南國學術》總編輯田衛平列席旁聽了10月22日的會議，並向部分專家約稿。

2017年10月24—26日，由《探索與爭鳴》雜誌社、上海市社會科學創新研究基地、全球城市與世界文明傳承研究基地聯合舉辦的“全球城市史：環境、城市網絡與空間生產暨第三屆全球城市史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師範大學桂林路校區召開，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廈門大學、澳門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同濟大學、華東理工大學、上海師範大學等機構的專家學者百餘人參加會議。《南國學術》總編輯田衛平應邀出席，並主持了第三場的會議發言。